

陈世松 主编

宋哲元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宋 哲 元 研 究

主 编

陈 世 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七·十二·成都

责任编辑：张 力

封面设计：张复祥

封面题字：尹昌言

宋 哲 元 研 究
SONGZHEYUAN YANJIU

陈 世 松 主 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5 字数：213千

1987年12月 第 1 版

1987年12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524-060-4/K·12

书号：(11316·82) 定价：1.7元



宋 哲 元

宋哲元研究

目 录

对宋哲元抗日事迹的考察

——兼论宋哲元的历史地位……………陈世松(1)

宋哲元与冯玉祥……………谭晓钟(32)

宋哲元与南京国民政府……………林 顿(60)

一二·九运动与宋哲元……………李全中(91)

通向芦沟桥：1935年日本

对华政策及其演变……………刘子健(118)

华北事变中的宋哲元……………代 山(152)

宋哲元与“华北经济提携”……………毛承豪(179)

论冀察政务委员会及其

主持者宋哲元……………龙 岱(194)

宋哲元的家事与生活……………李腾汉(230)

晚节无亏死犹荣

——宋哲元的晚年……………汪蜀翘 濮 实(247)

宋墓沧桑记……………刘长荣 钟利戡(263)

对宋哲元抗日事迹的考察

——兼论宋哲元的历史地位

陈世松

从芦沟桥事变开始的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已经50年了。今天，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对祖国对民族作出积极贡献的人们时，自然要提到在芦沟桥畔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的二十九军及其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是一位集抗日将军和地方实力派于一身的历史人物。宋哲元在抗战前夕走过了极不平坦的道路，有着极为复杂的经历和表现。迄今历史学家尚未对他的本质特点、功过是非作出盖棺定论。解放30多年来，由于极左思想作祟，学术界长期回避对宋哲元的研究，而有的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又根据抗战前夕，那些对他不谅解的言辞，简单地为他勾画了一幅暗淡可悲的脸谱。直到十年前，海外还有文章呼吁历史学家，应该帮宋氏“在历史上定个位”〔1〕。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在抗日战争中贡献了力量的炎黄子孙，不分党派，都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中也包括了对爱国抗日将领宋哲元的历史地位的恢复和肯定。在这种形势下，重新提出研究宋哲元历史的问题，无疑是必要的。本文拟对宋哲元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作为问题作一番粗略的考察，并借以对宋哲元的历史地位进行初步探讨。

1930年的蒋阎桂冯中原大战，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这场内战，对民国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战争导致了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重新改组和地盘 的重新调整；另一方面，有的军事集团的首领失势下野，而另一些新实力派人物却乘机应运而生。宋哲元就是以中原大战为起点，并利用中原大战后所创造的条件，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

中原大战后，在华北地区呈现出复杂纷繁的政治局面：拥兵关外的张学良，在蒋军胜局已定的形势下表示拥蒋，对战局起了决定的作用，他由此得以戴上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桂冠，并乘机取代阎锡山在平津的地盘。阎锡山接受中原成败的苦果，被迫下野，他所统率的晋军大部退回山西，但仍留部分兵力在华北并对局势产生影响。李宗仁的桂军见机不妙，从武汉撤回广西，打消了问鼎中原的念头。为中原大战的失败付出惨重代价的是冯玉祥及其西北军。冯玉祥在败局已成，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被迫宣布下野。拥有雄兵三十万的西北军，顷刻间犹如风卷残云，土崩瓦解，最后只剩下九万之众。由冯玉祥所苦心经营的河南、陕西及西北等省的地盘也丧失干净。号称西北军“五虎将”之一的宋哲元，利用其昔日在西北军的地位和影响，被拥戴为新的带兵首领。为了保存实力，宋哲元只得收拾残部退往晋南。

1931年6月，当宋哲元正式成为继冯玉祥之后的又一军事首领，并接受张学良的改编，出任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的时候，局促晋南的处境，粮饷不继的困难，使他饱尝了丧失地盘的苦楚，寄人篱下的辛酸。历史和现实赋予宋哲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寻

找一个足以容纳二十九军发展的环境和施展抱负的地盘。

然而，这时战火刚刚熄灭，各大军事集团的势力范围刚刚划定，他们之间虽然免不了仍有矛盾和争斗，但在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和制约下，却能维持其相对的政治平衡。显然，这种暂时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在短期内是难以使宋哲元大展抱负的。何况，宋哲元从这次中原战争之后，也得出一条深刻的教训：从此决不再打内战，并声言“本军之枪口誓不向内”〔2〕。因此，为完成历史和现实赋予他的任务，宋哲元不能不把自己的命运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这个饱经帝国主义侵略暴力凌辱和欺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激于民族义愤，奋起反抗，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反抗外国侵略暴力，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神圣权利。宋哲元从小目睹过八国联军侵略暴行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和耻辱，在他从军后也多次力挫横悍逞狂的日本人的气焰。中原大战后，宋哲元把自己的前途和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连结起来，这完全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时逢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暴行，唤醒了包括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意识，同时也为宋哲元脱离困境，从民族斗争的激流中寻求发展前途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向日本侵略暴力打出前途来”〔3〕。

以西北军为基础整编的二十九军，是一支有着强烈的抗日民族意识的队伍。这支队伍以农民为主体，他们宣称自己是“从乡间来的”、“老百姓的军队”〔4〕。灌输抗日教育，树立保国卫民思想是这支军队的一贯特点和光荣传统。尤其是这支军队中的中下级年轻军官，更洋溢着一股炽热的抗日激情。宋哲元正是依靠这样一支军队，在“九·一八”事变后，登上抗日的政治舞

台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即1931年9月20日，宋哲元率同其部下七名将领，“暨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号日通电”。电文历数日本侵略暴行“殊堪发指”，呼吁团结御侮，“一致对外”。最后，宋哲元还在电文中请缨抗日：“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此耻。……国家存亡，民族生死在此一举”[5]。自此以后，宋哲元埋头从事军事训练，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为口号，激励将士的爱国热情，全军将士同仇敌忾，时刻准备“效命疆场”[6]。所有这些，都为其后宋哲元率军奔赴抗日前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着，宋哲元又在1932年8月7日的《上张主任汉卿书》中，再次向张学良表达了自己的抗日主张和“誓雪国耻”的计划。宋哲元在信中分析形势说：日本“为贯彻其满蒙政策，巩固其攫取权益，定必先发制人，袭取热河，进扰平津，以颠覆我华北之策源地，而达其侵略之目的”。为此，宋哲元提醒张学良要“先期预防”，作好准备，“方免临时失措”。在此基础上，宋哲元还进一步提出了抗日雪耻的具体方案：“（一）热河方面，应以五万之兵力；（二）山海关方面，应以三万之兵力；（三）平津方面，应以三万之兵力。使各部队早日到达目的地，从容布置，熟悉地形，及防御工事之预备。庶敌兵突至，必可拼命抵拒”。宋哲元最后还慷慨陈词：“日本不以中国为国，更不以中国人为人，闻之令人痛心。吾侪以四万万人之国家，被六千万民族之岛国如此欺侮凌辱，闻之发指，言之痛心。誓雪国耻，唯力是视”[7]。

如果说，“号日通电”仅是事变甫始的政治宣言，那么，《上张主任汉卿书》则是在“外患进逼”形势下的具体抗日方案。无论从对形势的分析，时局的判断，也无论从雪耻救国方案

的提出，以及披沥陈词的态度看，都表明这时的宋哲元决非徒具抗日决心的匹勇之夫，而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的主将。宋哲元根据日寇侵犯的形势，预料热河、山海关、平津三处将是必争之地，须部署兵力预作防备。结合他此前请缨待命的态度，可以表明这三处地方正是他希冀陈兵抗日的最好战场。

1932年8月，宋哲元终于盼来了一个奔赴战场的好时机。经张学良的推荐，宋哲元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

这是宋哲元继1925年出任热河都督、1927年继任陕西省主席之后，第三次担任疆吏。这对于饱尝失去驻防地盘之苦和怀抱雪耻救国宿愿的宋哲元及二十九军说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此之前，1932年1月28日由蔡廷锴部十九路军在上海所进行的淞沪抗战，正时刻在鼓舞着他们，鞭策着他们。他们期待着以察省为基地，效法上海十九路军，建功立业，雪耻御国。

1933年初，正在宋哲元先率一部赴察省就任，二十九军大部还留驻晋南的时候，发生了日寇侵占山海关的事件。接着，日军挟进陷热河承德之淫威，出动陆空两军，长驱直入长城一线。形势陡然发生变化，平津受到严重威胁。在全国民众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调集北方各军和中央军，组编为八个军团进行抵抗。2月，驻防北平之东的二十九军改编为第三军团，在总指挥宋哲元的率领下，立刻开赴长城前线，奉命接替由热河溃败下来的东北军万福麟部一个旅的防御阵地。由于日军于3月9日抢先占领军事要隘喜峰口东北的长城制高点，于是一场争夺要隘各口的战役，不可避免地在二十九军与日寇间展开。

在从3月9日至4月13日喜峰口、罗文峪要隘争夺战役中，二十九军将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大刀迎战武装到牙齿的凶恶敌人的。但是，由于战争的正义性在我一方，二十九军将士抱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决心，誓死杀敌，加之成功地采用夜战和绕攻敌后的战术，故能给来犯的日军以重创，在喜峰

口歼敌逾三千以上，在罗文峪毙敌三千有奇，终于“造成自‘九·一八’以来北方战场首次之胜利”〔8〕。

这里我们勿庸赘述喜峰口、罗文峪战役的经过，及二十九军将士奋勇杀敌的情形，须着重强调指出的是，宋哲元在战役的全过程中，始终洋溢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义无反顾的抗日精神。

当战役刚刚开始时，宋哲元就在手谕中向各师传达了三点指示：（一）“此次作战死亦光荣。无论如何要拼命作阵地”；

（二）“不求与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之声威，而求日本人不能小看我们”；（三）“国家存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为了贯彻这些精神和原则，宋哲元还令参谋处规定了鼓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的具体奖赏办法：凡“在阵前生擒日本人一名，赏洋一百元。砍死日本人一名有据者，赏洋五十元”〔9〕。

当喜峰口战役初战告捷时，舆论称赞他们是“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的“英雄”。纷至沓来的慰问团体，携带着大批慰劳物品前来慰劳二十九军。宋哲元不为一时的胜利所陶醉，他从全国同胞的支持赞扬中汲取力量，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抗日意志。他在致前方官兵的电令中说：“我军此次受全国民众之称扬援助，为国军抗日以来所未有著也。望我前方将士，务本汉贼不两立之牺牲精神，沉着杀敌，坚持到底，殉国救亡，此正其时。幸勿辜负全国亲爱同胞之赞美与期望之热诚，是为至盼”〔10〕。

历时一个多月的长城抗战，终因右翼战线的不利，导致全线总退却，宋哲元只得“忍泪撤退”。当国民党当局加紧向日军谋求停战，屈辱地签订《塘沽协定》，最终宣告国民党军队长城抗战失败时，宋哲元对这次局部抗战的失利作了认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省。他指出：“我国自九·一八以来，日日不能免战之期，而终未成整个之作战计划。迨乎绝不可避免之时，又无统一的指

挥能力，与充分的接济与准备”。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当局“仓卒应付”，“徒驱数十万之骄兵惰卒，以与械新弹足之暴日周旋。卒至伤亡狼籍，精锐殆尽，演成塘沽协定”。宋哲元等痛心地说：“雪耻适足以增耻”。〔11〕为了给日后的对日战争作好准备，宋哲元还本着“先事不忘，后世之师”的精神，认真从联络、运输、友军情形、新兵器、夜袭、防御、退却等战略战术方面进行反思和总结。他把由此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和改进意见，称为“本军此次流血所换来之代价”〔12〕。

在30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在地方军阀、蒋介石集团和人民力量的交织发展中，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有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最终促成某些地方实力派由内战向抗日的转化。这种情形，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表现较为普遍。宋哲元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中原大战中较早地认识到内战的穷途没路，决心改弦易张，从民族斗争中寻求发展前途。由于宋哲元能够把奉命参加长城抗战与“国家存亡”、“民族生死”和“本军存亡”联系在一起，即把国家民族利益和二十九军的前途及本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能在长城抗战的全过程中，表现出坚定的抗日决心与崇高的爱国热情。长城抗战的业绩虽于全局无大补，但这种抗日决心和爱国热情却能在当时威慑日寇，振奋民心。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未尝挫创，独此长城战败，以为奇耻大辱。从此，宋哲元的威名，“终悬于日人之心目中”〔13〕。宋哲元部二十九军，也赢得了与蔡廷锴十九路军齐名的美称。正如天津《益世报》在一篇社论中所说：“十九路军淞沪一仗，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二十九军）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做人”〔14〕。

1933年5月，长城战役结束，《塘沽协定》议起。时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省举起抗日义旗，掀起保国御侮，收复失地的新高潮。未几，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势力的夹击下宣告失败。8月，宋哲元回察，继履察任。从此，宋哲元在抗日的道路上进入了一个拥有地盘，自成局面的新阶段。

从表面上看，宋哲元军队的实力这时比长城抗战前有所增强。宋哲元利用接收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各部之机，采取“多编少遣”，保留骨干的对策，增添了包括佟凌阁等部在内的抗日力量；收编了不肯投降伪满的热河省的汤玉麟部。一时间，二十九军的人数由战前的一万人剧增至四万余人。但由此也引起了给养供应的困难。当时察哈尔地瘠民贫，全省仅辖“十五、六县”，与华北地区的河北、山东、山西三省皆治百县相比，宋哲元自愧勿如，甚至不敢与三省主席并座“论列政治”〔15〕。尤其严重的是，自《塘沽协定》签订以来，宋之治察仍然要受到来自蒋介石集团和日本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与限制。这一点，与冯玉祥在察时没有两样。

一方面，蒋介石集团以《塘沽协定》换来平津的苟安，中断了长城战役开始的局部抗战。接着，他又集中力量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南京国民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指导下，继续对日奉行妥协让步的外交路线。宋哲元虽以喜峰口抗战赢得了国民政府的嘉赏，但在蒋介石眼中，他毕竟是非嫡系的西北军将领，昔日的对手。当长城战役后宋哲元声名大

增，实力遽长之时，蒋介石更是不愿让宋的实力“坐大”，造成西北军东山再起的局面。因此，在从政治上压制国民党官兵的抗日要求的同时，蒋介石又从经济上克扣二十九军的军费。尽管二十九军这时的人员比过去增加了约三倍，但从蒋介石那里所能领得的军费却缩减了五倍之多。显然，宋哲元返察后的处境仍然艰难。

另一方面，日本因《塘沽协定》之便，得以在使南京政府承认其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恃无恐地染指华北。作为“帝国大亚细亚政策之实践”，日本关东军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要在察绥境内策动建立第二个傀儡组织——伪“蒙古国”，以图最终敲开华北的大门。因此，察哈尔省作为“前线省”，其战略地位显得日益重要。宋哲元于此时继主察政，不仅给伪满州国西南境和日本策划建立内蒙伪政权的活动带来威胁，而且也给日本图谋华北造成巨大障碍。这是日本侵略军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因此，日本侵略军的既定政策，就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消灭这支抗日军队。暂时消灭不了，就采取步步侵逼，蚕食鲸吞二十九军防地的手段，直至把二十九军赶出察哈尔省。

在这种背景下入主察政的宋哲元，不能不面临新的考验。这是因为，《塘沽协定》限制中国军队从划定的冀东战区撤退后，不得再有任何“挑战之举动”，而日本军队则可根据条文的规定，有权在中国领土上“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以行视察”。屈辱的《塘沽协定》在实质上剥夺了中国军队对日武装自卫还击的权力，并对华北地区的抗日活动采取取缔态度。所有这些，都对于坚持抗日立场的宋哲元部二十九军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说，在长城抗战中宋哲元还可以通过武装抗战来实现“雪耻御国”的意愿的话，那么此时此刻的宋哲元，则只能在守土中来竭尽自己御国的职责。黄郛在致宋哲元的电文中，历述其当时的处境说：“吾

人夹存其（人民、敌国、政府）间，欲谋救国，实苦无途径可循”〔16〕。这句话虽有其亲日行径辩解之意，但确也多少描写出当时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共同心理。

然而，这决不是说，宋哲元在历史所提供给他的这个十分有限的舞台上，是完全被动的和无所作为的。为了考察宋哲元在继主察政阶段的作为，有必要先把这一阶段上日本的侵略意图作一番剖析。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日本侵略者就曾经考虑要制造一个“独立”的内蒙古。1932年，日本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过程中，侵占了内蒙古东部地区，并设置兴安省以加强其殖民统治。1933年2月，日军占领热河后，紧接着向察哈尔进军。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的目标，一方面加紧其军事侵略步伐，以武力占领察省重镇多伦，并派特务机关在多伦建立据点；另一方面则在蒙古王公上层中大肆进行政治宣传和诱降活动。7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提出《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纲要》，阴谋挑拨察北蒙汉民族关系，为分裂中国制造舆论准备。其后，日本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又进一步提出《有关建设蒙古国之意见》。接着松室孝良等人便明目张胆地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进行建立继伪“满洲国”之后第二个傀儡政权——伪“蒙古国”的活动。

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分裂阴谋，宋哲元首先在察哈尔省采取了一系列强边固本的措施。本来察省汉蒙杂处，素号难治。自清以来，边内蒙古前来归附者凡六盟，其中察哈尔辖其二盟。锡林郭勒盟近在肘腋，分五部十旗。独苏尼特部之札萨克亲王蓄有异谋。为此，宋哲元“推诚和辑，预杜反侧”〔17〕。与此同时，宋哲元注意加强察省内部建设，在现存的《察哈尔政书》中，犹可见其施政概要，对察省交通、水利、林业、工商、市政建设、教育等各方面均有兴革。其中，以修坝、造林、敷设公路、筹开龙

烟铁矿等，尤有显著之绩，为时所称道。作为筹边防患的重要措施，宋哲元一方面选择战略要点，命所部二十九军修筑了神威台等国防工事；另一方面，又在察省办理赈务，安辑流亡，于加卜寺设农村建设委员会，“开发农牧，移民以居，用固睡圈”〔18〕。

宋哲元作为一位领兵疆吏，他还替国民政府承当了警戒日本侵略阴谋的作用。宋哲元多次给驻北平的何应钦报告日军在察东的移动情况。在何应钦向南京政府报告有关日伪在多伦设立行政公署的电文中，曾经明确提到，宋哲元曾经两次向北平密报日本在察东组织自治公署的情况〔19〕。宋哲元不只随时向何应钦报告日本策划伪蒙政权的动向，为南京政府提供最新情报，而且，他还针对日伪的阴谋活动，提出挫败日伪奸谋的对策和建议。例如，1935年4月17日宋哲元致汪精卫电说：“惟德王府左近日人设有医院一所……拟由察省在该处另设医院一所，以示国家扶助蒙族之意，藉伐日人诱惑之谋”〔20〕。

为了履行捍卫疆土的神圣职责，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在1933年底至1934年冬间，还在军事上与日伪军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其中，包括派兵进入察东，追剿叛逃的刘桂堂部；对悍然入侵察东的热河伪军和日本关东军，行使自卫权利，予以击溃；对擅入张北，拒不出示证件的日本人实行盘查和扣留等等。

应该指出，宋哲元的上述作为仍坚持了“反满抗日”的基本立场。在监视和抵制日本侵略者策划建立伪“蒙古国”的活动方面，宋哲元发挥了华北其他驻军将领所不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宋哲元再次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嫉恨。从1934年11月起，日本开始了以驱赶宋哲元军为目的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察哈尔省发生了所谓的“察东事件”和“张北事件”。

本来，发生在1935年1月和6月的所谓的察东事件和张北事

件，就其起因，性质与宋哲元的最初措置，和一年前的同类事件没有什么两样。但它们之所以能升格为中日外交上的“事件”，则完全是由于日方态度强硬，而南京政府当局不断妥协退让，一再迎合日方要求的结果。这样，作为察东、张北事件的最后结局，也不能不与一年前的结局大相径庭。

1935年，南京政府继续奉行对日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决不是偶然的。日本继在1933年3月正式宣布退出国联。公开宣布其对华独占政策之后，1934年7月成立冈田内阁，军部干预政治更加露骨。1935年新年伊始，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确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迫使中国取消“排日”活动，“调整”日华政策，最终促成中国分裂，以至不战而独据中国。在日本的强硬外交压力下，蒋介石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向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日本不是中国的“敌人”，日中应有“携手之必要”。作为对日妥协的重要步骤，蒋介石于1935年1月向日本驻华公使发出了“中日应该亲善”的信号。接着，2月，南京政府又有派遣专使王宠惠的东京之行。6月，南京政府终于颁布“禁止排日令”〔21〕。与日中政府间的这种“亲善”气氛形成鲜明对照，宋哲元部二十九军之在察哈尔省抵制日本关东军和热河伪军侵略阴谋的行动，显得格外刺眼和不协调，因此，它必然要招致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势力的共同压迫。

在察东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以二十九军“侵犯”热西为借口，发出声明要“断然扫荡”宋哲元军，命驻防热河承德的第七师团谷实夫旅团开赴热察边境进行恐吓。国民政府生怕事态扩大，影响中日“亲善”，一开初就把这一事件限制为“地方事件”，对宋哲元的抵制立场采取压制态度。在何应钦下令宋哲元军停止抵抗，退出察东防区之后，日军竟突然向宋部发起大举进攻。宋哲元希望政府当局能就此与日交涉，以阻止日军的入侵。